

■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

习俗与经济

[德] 埃克哈特·施里特 著

秦海 杨煜东 张晓 译 / 秦海 校

**ON CUSTOM
IN THE
ECONOMY**

EKKEHART SCHLICHT

长 春 出 版 社

ON CUSTOM IN THE ECONOMY

EKKEHART SCHLICHT

责任编辑 张耀民 封面设计 郝 威

ISBN 7-80664-962-X



9 787806 649626 >

ISBN 7-80664-962-X/ F·96 定价:35.00 元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习俗与经济

[德] 埃克哈特·施里特 著
秦 海 杨煜东 张 晓 译
秦 海 校

长 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习俗与经济/ (德) 施里特编; 秦海, 杨煜东, 张晓译。—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5.5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书名原文: On Custom in the Economy

ISBN 7-80664-962-X

I. 习... II. ①施... ②秦... ③杨... ④张... III. ①风俗习惯—关系—经济—研究 ②生产关系—研究 IV. F0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8179 号

责任编辑: 张耀民 封面设计: 郝 威

“©Ekkehart Schlicht, 1998”

“On Custom in the Econom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8.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邮编: 13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编委会

主编
编委

秦 海

马春文

张 平

路 风

张宏俊

冯 军

张晓晶

陶修明

张颖新

吕传俊

周汉华

王维德

余 晖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总序

秦海

我始终坚信，在学术界发生的事情，对思想观念的发展和传播，以及最后对这些思想观念转变为现实，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詹姆斯·布坎南（1986）：《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一直是被不同学者所使用、而不作出严格定义的一个术语，在不同学者的心目中似乎并没有达成一致性的认同^①。同时，新政治经济学也常常与政治经济学相混用。

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对于那些对个人的成长经历赋之于回忆或期望的人而言，在他们的成长的岁月中，所接受的政治经济学教育就是政治经济学，而且这是一门被称之为研究生产关系的学问。

按照经济思想史家的说法，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石，或者被称之为是社会科学的皇后。据说，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产生于17世纪的法国，蒙特克雷

2 总序《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国爱丁堡大学经济学系高级讲师斯图尔特·塞耶尔 (Stuart Sayer, 2000) 《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一个总括》一文中的看法, 在 18 世纪到 19 世纪, 甚至到 20 世纪, 经济学经常被称之为“政治经济学”, “这一术语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流行看法, 即经济学与政治学是紧密联系的, 政治因素在决定经济后果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①

“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 作为丛书的编者所需要回答的问题, 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 按照塞耶尔的说法, 20 世纪 50~70 年代, 在新古典经济学所驱动的——至少在局部——为经济分析提供一个更加严肃的科学基础的过程中,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效用和生产函数、市场互动的约束条件确实成为经济分析的重心, 但是, 在这一过程中, 政治约束确实也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 只不过经常是松散的和不得要领的, 并且在某些文献中, 经常被称之为具有“右”派或“左”派的倾向, 直至肯尼思·阿罗 (Kenneth Arrow, 1963) 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邓肯·布莱克 (Duncan Black, 1958) 的《委员会和选举的理论》以及詹姆士·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 (James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1962) 的《同意的

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有关。

新政治经济学“新”的第二方面是，旨在打开经济政策形成的“黑箱”。在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政策的形成经常将经济政策决策看成是一个黑箱，在理性人或者是经济人行为的最优化中，政策工具和制度设计经常被自觉地作为外生变量来看待，或者是被排除在经济分析的范围之外。无论是规范分析，还是说明性的阐述，政策决策者经常被看成是一个乐善好施的社会计划者，他追求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他会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无效率状态进行直接干预，在这样的分析中，这种干预可能导致的资源配置的再扭曲、棘轮效应等等都被舍弃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这种分析方法，自然有它的优点，起码从读者的立场看，不存在政治学的阴暗面，而且领会不到制度设计的细节和意识形态的包袱，有助于形成更加技术化的经济分析的风格和模式。实际上，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无论制度背景如何，大量存在着“创租”和寻租的行为，一种政策的后果经常超出了决策者的意料之外。打开政策形成的“黑箱”不等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更可能是“叶公好龙”或者是政策形成过程本身所内植的“皮克马利翁”效应。

20世纪80年代是新政治经济学最为活跃的年代，根据旅美以色列经济学家艾伦·

4 总序《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等。在新政治经济学看来,权力是一个人为了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的能力;权威,也就成了一个人、几个人、或者更多的人明显地或者默认地认可某个人为他们在某些行动领域做出决策的状态。信息、知识、激励等理论这些在主流经济学发展中所获取的革命性发现也就被纳入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来源。20世纪80~90年代的新政治经济学也就顺理成章地包括了民主和政治权力的度量、新闻自由、人权、法院的独立性、产权保护、法律和司法制度的透明度、犯罪、腐败以及社会和政治暴力、政治不稳定等等方面的研究主题(Sayer, 2000)。^①

新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为了复兴经济思想史中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而是为了获得社会科学的突破。1996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创立了《新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其创刊词写道:“托克维尔曾经断言,新世界需要新科学。从现代的意义上看,新世界不仅表现为世界经济的新的发展,而且表现为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更重要的是,这些方面的发展和构成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接着这份创刊词继续写道,“理解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构,需要一种全新的分析方法和理论,以便为清除智识上的障碍做好准备,并需要把不同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新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将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广度和睿智与20世纪社会科学的

经济史(通常以制度和微观经济学作为理论背景)、认知、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的作用等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沿性论题。当然,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也被有些学者称之为“实证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是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历史传承中所进行的理性决策研究(Jams E. Alt and Kenneth A. Shepsle, 1990),甚至干脆称之为“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蒂莫西·拜斯莱(Timothy Besley)在2004年10月13日英国科学院的凯恩斯经济学讲座所作的《新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指出,“新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理解政策领域所产生的重要问题。虽然在一些场合经常存在着这样的暗示,但是,它并不是经济学家们为了向政治科学领域扩张而进行的一种努力。相反,它主要关注的是将经济学家们的能力扩展到需要某些工具才能进行经济和政治决策的问题上。”^①20世纪经济学范式的履新、分析工具的进展(博弈论、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等),特别是“冷战”之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边界已经大大地扩展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能力,新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回应适逢其时,应运而生。就正如贝斯莱所言,“新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扩展经济政策分析领域并因而强化它的相关性的学说”。就编辑这套丛书而言,我们的主张是,经济学家、公共政策决策者、学生以及对社会生活怀着强烈求真欲的人们,更需要理解政治行为、经济利益、

6 总序《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Blinder, Alan S. (1999): Economics Becomes A Science-or Does It?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April 23, 1999.

Drazen, Allen (2000): Political Economy in Macro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robak, John N. and John V. C. Nye, 1997, edited: The Frontier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cademic Press.

Morgan, Mary S. (2001): The Foundation of “Morden” Economics: Engineering and Ideology, Working Paper No. 62/01,
<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EconomicHistory/pdf/wp6201.pdf/>

Sayer, Stuart (2000): Issues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An Over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 Vol. 14. No. 5.

詹姆斯·M. 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平新乔、莫扶民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詹姆斯·M. 布坎南、戈登·塔洛克：《统一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

中文版序言

兹呈献给中文读者的习俗理论植根于欧洲思想界的两种线索：苏格兰启蒙主义运动和德国格式塔心理学。它的视角是普适主义的：我们所观察到的环绕世界的斑驳陆离的种种习俗归因于恒定的文化力量。它是令人感兴趣的，且将它运用于中国的经验也是一种挑战。

伟大的中国思想（比欧洲的思想更加历史悠久）必须包容那些持有立场相同、表达不一，但是实际上相当于同一洞察力的作者。本书可能会激励这些思想的线索，并且会从不同的角度阐明它们。因此，欧洲的涓涓细流可能会汇入全球浩瀚的人类知识的洪流。

埃克哈特·施里特
2004年2月，慕尼黑

序 言

本书的目的是重建习俗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当前的经济理论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支撑市场交易的习俗的力量。经济社会学家通过讨论一切经济过程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不断重复地强调这一问题。然而, 尽管市场交易以习俗的组成要素为转移, 受到习俗组成要素的影响, 经济过程也反作用于习俗。迄今为止, 人们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关注不多。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道路也指出了这一不足。制度经济学最初认为经济制度来自市场过程和竞争并对之进行分析, 而回避一切习俗因素的影响, 但是, 越来越明显, 这样获得的结论严格地依赖于关于习俗基础结构的一些不曾明言的假定。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分析习俗的组成要素与市场过程之间的必要的联系。

当今的一个思想线索, 显然首创于博弈论, 尝试解释习俗的出现, 即认为习俗是已经被采用的日常惯例, 因为它们在竞争中胜出。这一分析方法把不同的习俗当做解决协调问题的不同惯例(conventions)。它是由经济范式驱使的, 即把行为完全简化为(既定的)偏好与约束的交互影响, 而忽视了习俗的直接动机的影响。因此, 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 以一种系统的方式调和习俗动机的重要性与制度理论分析。在经济学中, 习俗的理论重建将为制度思考提供基础, 并且将有助于减少当今思想的某些随意性。

2 习俗与经济

本书强调的这些问题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基本问题。本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跨越了这些学科之间的界限。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在社会科学中,这些界限不能以一种有效的方式组织劳动分工,而且相当妨碍且经常挫败思考这些基本问题的尝试。本书关注这些基本的问题。

本项研究始于1985~1986年普林斯顿高级研究中心关于企业理论的项目。在那里,我非常幸运遇到了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斯(Solomon Asch)和经济史学家埃瑞克·琼斯(Eric Jones)。他们两人对我的思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87~1988年冬季,在布朗大学逗留期间,我开如撰写这部书的草稿,1991年夏季在明尼苏达大学对这部书稿继续工作。结果令我无法满意。太多的问题依然存在。我已经采用的整个分析方法似乎是错误的。我又从头开始。这本书就是结果。1995年冬季在墨尔本大学墨尔本商学院,完成了本书手稿的构思和写作。与埃瑞克·琼斯的讨论帮助我为我想说明的问题设计了一个新的概念框架。他鼓励我不要关注技术问题,而是要专注于基本问题,有时甚至是方法论问题。

<

的批评。我亲爱的妻子对本书给予了深刻的理解。她催促我完成这一项目，并与我讨论了许多问题。我感谢她和我们的儿女们对我一贯的支持。

下列的机构提供了有帮助的研究支持和资助：普林斯敦高级研究中心、布朗大学经济学系、明尼苏达大学产业关系中心、柏林高级研究所、德意志银行基金会、赛森基金会（Thyssen Foundation）。黑森和巴伐利亚教育部提供了带薪假期，使我以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这项科学研究成为可能。最后，特别感谢墨尔本大学商学院以及它的院长 John Rose 提供了优越的研究环境。

埃克哈特·施里特
1997 年 11 月，慕尼黑



导 言

在写作关于习俗的著作时，我感觉自己像是一条鱼，正在思考水如何影响鱼的生活。这是一项令人惊愕的任务。

习俗在一切生活环境下都是普遍存在的。它塑造习惯和信念，支配情绪和认知，影响动机和行为。通过这些途径，习俗渗透到社会和经济的互动过程之中。习俗的许多个别的影响扩散到整个社会体系并在其中相互作用。这意味着识别单一的因果链是困难的。此外，习俗以非常自然的方式影响动机、信念和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和经济过程的习俗性基础就很难辨别，并且有时候甚至是看不见的。尽管难以理解，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话来讲，习俗“对世界历史施加了深刻和支配性的影响”。^①

在某些方面，习俗减弱了经济和社会的互动，并在其他方面制约了这种互动。在观察“有效的规范能够建构一种强有力的社会资本形式”的时候，社会学家们已经强调了习俗对社会协调的优势。^②相反，经济学家们把“习俗的紧箍咒”描述为“妨碍生产方式和生产者自身自由发展起来的特征”^③的东西。这些观察指出了习俗的重要特征。然而，更深刻的理解则需要分析种种习俗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们如何影响行为。

2 习俗与经济

主义者的概念不符合描述可以理解的习俗的非工具性的重要特征的要求。当然，如果其他人也都这样做，那么，沿着道路的右侧行车是明智的。这样做，右侧行车的普及可能就表示右侧行车的习惯。这是一个简易的例证。这一论点将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坚持那些对个人来说需要花费代价的规则，比如信守诺言、尊重财产权或给小费。这些行为是由习俗所维持的。他们为一切类型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提供了基础。习惯性规则的遵从比简单的工具性证据——例如对右侧行车的习俗的简单说明需要更加深刻的思考。

本书所追求的习俗理论强调来自于针对行为一致性和合理性的个人奋斗的动机的力量。习俗被描述为来自对行为、信念和感情彼此之间紧密联系的特定的个人愿望。人们对示范行为、根据他们的信念采取行动以及根据他们的经验形成信念具有偏好。行为、信念和情感之间的联盟是由发生在人类心智中的过程所产生的。

这些心理过程（被称之为“澄清”过程）不仅限于认知，而且彻头彻尾地调整了心理有机体的结构。模式识别——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动的——能够根据澄清过程得到解释。同样，日常惯例和习惯自发地建立在那些逃避我们的定期考虑的已经被感知的规律性基础之上。促使日常惯例和习惯稳定化的情感的组合